

武汉大学党内法规研究中心 主办



党内法规理论研究

RESEARCH ON THEORY OF LAWS
AND REGULATIONS OF

CCP

2018年第1期
(总第1期)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CHINA)

武汉大学党内法规研究中心成立于2016年9月21日。中心由中共湖北省委办公厅与武汉大学共建，是全国第一家党内法规实体性科研机构。中心按照建设全国党内法规研究高端智库、党内法规理论研究和创新基地、党内法规制度教育培训基地的“一库两基地”目标定位，主要承担党内法规基础理论和应用理论研究、对策研究、人才培养和学术交流等基本任务。依托马克思主义理论、法学、政治学等优势学科，党内法规研究中心的专家学者围绕党内法规基础理论、党内法规与国家法律的关系、党内法规实施机制等问题，已经出版学术专著数十部，发表学术论文数百篇，并提交多篇咨询报告，形成了一批具有重要理论价值和实践价值的标志性成果。

《党内法规理论研究》
编委会

主 任 王亚平 周叶中

副主任 李斌雄 艾海滨 祝 捷

编 委 (按姓氏笔画排序)

王伟国 刘茂林 张晓燕 陈焱光 罗永宽 秦前红

主 编 周叶中

副主编 祝 捷 伍华军

编 辑 袁晓峰 王 萌 邵 帅

武汉大学党内法规研究中心 主办



党内法规理论研究

RESEARCH ON THEORY OF LAWS
AND REGULATIONS OF

CCP

2018年第1期

(总第1期)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CHINA)

党内法规理论研究 2018 年第 1 期 (总第 1 期)

目 录

【创刊词】

永远在路上 本刊编辑部 / 1

【主题论文】

本期主题：“马克思主义关于党内法规制度建设的经典思想”

论坚持思想建党和制度治党紧密结合 周叶中 汤景业 / 2

新时代制度治党思想的问题意识、理论渊源和内容体系 祝 捷 / 12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党内法规思想溯源 侯嘉斌 / 50

【实务探讨】

新时代党务公开理论创新 张晓燕 / 61

论党内法规实施后评估的主体与对象 伊士国 郭 康 / 76

运用法律保留原则推进党内法规体系建设的思考 张小帅 / 92

【文献分析】

新时代以来党内法规研究回顾与展望

——以 2012 ~ 2018 年 CNKI 核心期刊文献为分析对象

..... 肖金明 冯晓畅 / 109

党的十八大以来党内法规研究量化分析

——以 CSSCI 期刊论文为样本 段 磊 秦 玲 / 133

【域外借鉴】

英国政党成员权利保障的司法实践评析 朱福惠 肖琼露 / 148

【研讨实录】

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政治宣言和
行动纲领 陈洪波 / 162

新时代加强制度治党和依规治党的行动纲领 周叶中 / 165

适应新时代立党管党治党建设党需要的总章程
——关于党的十九大对党章修改的认识
..... 李斌雄 / 167

高扬新时代思想旗帜 深化依法治国实践 刘茂林 / 169

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是党的建设重大创新 丁俊萍 / 171

社会主要矛盾新论断对唯物史观的坚持与发展 罗永宽 / 173

坚持依法治国和依规治党有机统一，全面推进法治
中国建设 李 牧 / 175

坚决维护习近平总书记的核心地位 王鹏程 / 177

【稿约函】

【创刊词】

永远在路上

本刊编辑部

乘着新时代东风，《党内法规理论研究》如期启航。

新时代，开启了全面从严治党新篇章。加强党内法规制度建设是全面从严治党的长远之策、根本之策。使命引领未来，使命呼唤担当。党内法规理论研究方兴未艾。武汉大学党内法规研究中心作为全国首家省校共建的党内法规实体性科研机构，在社会各界大力支持下，在各位同仁共同努力下，积极发挥平台优势，集合全国法学、党史党建、政治学、马克思主义理论等领域权威专家学者，汇聚理论界与实务界优秀研究力量，力求创办覆盖面广、影响力大的全国性党内法规专业刊物，致力打造连接理论与实践的党内法规重要学术阵地。《党内法规理论研究》应运而生。

根植时代，着眼实践，面向未来。作为一本肩负使命担当和责任重托的刊物，凝心聚力扎实推进党内法规制度建设是我们的目标和追求。我们必将高扬伟大旗帜，始终把准党内法规理论研究正确航向；秉持学术品格，奋力推动党内法规建设事业蓬勃发展；坚持问题导向，努力为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贡献才智。

前无古人的事业，成就于不忘初心的情怀之中；从严治党的征途，孕育于砥砺前行步伐之中。全面从严治党任重道远，党内法规理论研究脚步永不停歇。我们，永远在路上。

【主题论文】

本期主题：“马克思主义关于党内法规制度建设的经典思想”

论坚持思想建党和制度治党紧密结合

周叶中* 汤景业**

伴随着世情国情的深刻变化，当代中国不仅面临着“发展起来”后向新时期转型过渡的诸多体制机制矛盾，还面临着“走近世界舞台中心”后的种种严峻挑战。“应对和战胜前进道路上的各种风险和挑战，关键在党。”^①面对这一系列新情况新问题新挑战，在“治国必先治党，治党务必从严”现实逻辑下，中国共产党管党治党的任务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为艰巨、更加紧迫。为了确保中国共产党在形势深刻变化的历史进程中“始终走在时代前列”“始终成为全国人民的主心骨”“始终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坚强的领导核心”^②，必须坚持“党要管党”、全面“从严治党”。对此，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强调坚持思想建党和制度治党紧密结合，使加强制度治党的过程成为加强思想建党的过程，也要使加强思想建党的过程成为加强制度治党的过程^③。坚持思想建党和制度治党紧密结合成为新时期“党要管党”如何“管”，“从严治党”如何“治”的破题良方，揭示了新形势下全面从严治党重要规律，有力地推动着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不断走向深入。

一 坚持思想建党和制度治党紧密结合的理论意涵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着眼于进行具有许多新的

* 周叶中，武汉大学党委常委、副校长，武汉大学党内法规研究中心主任，武汉大学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 汤景业，武汉大学党内法规研究中心研究助理，武汉大学法学院博士研究生。

①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习近平关于全面从严治党的论述摘编》，中央文献出版社，2016，第6页。

②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习近平关于全面从严治党的论述摘编》，中央文献出版社，2016，第1页。

③ 习近平：《在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总结大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14年10月9日第2版。

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将中国共产党在长期革命、建设和改革实践中积累的经验予以总结提炼，提出坚持思想建党和制度治党紧密结合的重要论断，形成了以全面从严治党为本，“思想建党”“制度治党”为抓手的“一体两翼”工作格局。党的十九大报告进一步提出了“思想建党和制度治党同向发力”的重大决断，准确界定了两者在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中的作用方式是“同向发力”，为新时期全面从严治党提供了强有力的理论利器。廓清思想建党和制度治党“紧密结合”的现实状态，必须着眼于思想建党和制度治党两者间的辩证关系，从理论上对两者同时、同向发力的格局予以解构。

（一）思想建党和制度治党各展其能而各得其所

作为党的建设的有机组成部分，思想建党和制度治党紧密结合效能的实现，必须以思想建党和制度治党两者功能的有效发挥为基本前提，即各自通过自身的作用机制影响党员特别是党员领导干部的价值观念和行为规范。否则，即便两者结合紧密，也难以形成管党治党的合力。因此，思想建党和制度治党紧密结合的第一层意涵在于思想建设与制度建设各自通过发挥自身作用机制的特点，各展其能而各得其所。

思想建党是党的建设的灵魂。坚守共产党人的精神追求，始终是中国共产党安身立命的根本。在“我们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接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①的今日，作为执政党的中国共产党也未曾像今天这样面临精神垮塌的危机。正如习近平总书记直面当前党内队伍中存在的各种光怪陆离的现象^②，严肃指出了部分党员干部身处物质丰富的时代信仰迷茫、精神迷失的问题。对于共产党人而言，动摇了信仰，背离了党性，丢掉了宗旨，就可能在“围猎”中被人捕获。^③面对长期执政的考验，我们尤其需要赓续“思想建党”光荣传统，通过党性教育和理论武装等方式，使广大党员干部在“加油”与“补钙”中用科学的理论武装头脑、洗涤精神、触动灵魂，不断培植自身的精神家园。唯有如此，才能锻造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支柱与政治灵魂，以崇高的道德追求铸造精神境界，夯实全党思想认同、政治认同、情感认同等现实基

① 中共中央宣传部编《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读本》，学习出版社、人民出版社，2016，第7页。

② “有的对共产主义心存怀疑，认为那是虚无缥缈、难以企及的幻想；有的不信马列信鬼神，从封建迷信中寻找精神寄托，热衷于算命看相、烧香拜佛，遇事‘问计于神’；有的是非观念淡薄、原则性不强、正义感退化，糊里糊涂当官，浑浑噩噩过日子；有的甚至向往西方社会制度和价值观念，对社会主义前途命运丧失信心；有的在涉及党的领导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等原则性问题的政治挑衅面前态度暧昧、消极躲避、不敢亮剑，甚至故意模糊立场、耍滑头；等等。”见中共中央宣传部编《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读本》，学习出版社、人民出版社，2016，第108页。

③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习近平关于全面从严治党论述摘编》，中央文献出版社，2016，第68页。

础,在看不见“硝烟炮火”的思想阵地上擎起高扬的旗帜。

制度治党是党的建设的基本保障。现代政治文明的核心是制度文明,即以制度拘束政治行为,以制度规范政治运行,以制度催生良性行为习惯。^①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邓小平同志在深刻总结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正反两方面经验时强调制度建设的重要性,提出“我们过去发生的错误,固然与某些领导人的思想、作风有关,但是组织制度、工作制度方面的问题更重要”,“制度好可以使坏人无法任意横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无法充分做好事,甚至会走向反面”^②。制度治党则是以制度的理性约束人的非理性,为全面提高党的建设科学化水平提供根本保障:一方面,以民主集中制为基础的制度汇聚了多数人智慧,有利于实现多元利益的平衡而克服少数人的恣意;另一方面,制度具有稳定性、长期性、全局性特征,以制度将党员的权利义务规范起来、约束起来,能够为广大党员提供可期待的预期,进而防范权力的任性。正是基于这一逻辑,习近平总书记在十八届中央纪委五次全会上提出“在坚持中见常态,向制度建设要长效”^③,以制度治党“铁打的营盘”管住“流动的党员”,奠定管党治党的坚实基础。

(二) 思想建党和制度治党相互配合相互促进

在全面从严治党时代主题下,既注重思想建党又强调制度治党已经成为我们党的重要标志,也取得了一系列显著成效。然而,两者各自功能的有效发挥并不当然地等同于两者同时、同向发力:一方面,思想建党并非万能,由于体制机制的不完善,客观上为歪风邪气留有生存空间,致使思想教育的成果难以有效巩固与维持;另一方面,我们党确立的制度不少,一些制度在实践中难以有效付诸执行或执行效果难以达到预期效果。思想建党和制度治党紧密结合的第二层意涵在于深刻把握思想建党和制度治党之间的辩证关系,积极促成两者相互配合且相互促进的格局,实现两者良性互动。

第一, 思想建党是制度治党的重要前提

思想建党是中国共产党将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同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伟大实践相结合的结晶,决定着党的建设的性质和方向。^④基于这一前提,邓小平同志深刻指出:“过去我们党无论怎样弱小,无论遇到什么困难,一直有强

① 周叶中:《以法治思维的培养为突破口推进党内政治文化建设》,《理论视野》2017年第5期。

② 《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第333页。

③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习近平关于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论述摘编》,中央文献出版社,2015,第146页。

④ 全面从严治党研究课题组:《全面从严治党理论与实践研究》,人民出版社,2016,第45页。

大的战斗力，因为我们有马克思主义和共产主义的信念。有了共同的理想，也就有了铁的纪律。”^① 任何制度均有其理论基础与价值目标，党的制度建设需从思想上正本清源，阐明制度“是什么”“为什么”以及“怎么样”的现实问题。缺乏科学的理论指导，党的制度建设就失去了灵魂与方向。因此，思想建党为制度治党制定科学合理、严密规范的制度体系提供了前提与基础，起到了引领作用。

第二，制度治党是思想建党的重要保障

邓小平同志曾经指出，“要解决思想问题，也要解决制度问题”^②，“制度问题不解决，思想作风问题也解决不了”^③。制度治党的要领在于精准发现问题、指明问题，在分析与细化问题中有效地解决问题，并因此产生警示作用。党的制度在一定程度上是党的思想、理论、纲领与宗旨的外在表现形态。换言之，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贯彻执行需要强有力的制度予以保障，党的思想建设亦需要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长期性的制度予以系统化、规范化。一旦制度治党失之于宽、失之于软，党员干部思想上就容易出现松懈与动摇。

第三，思想建党和制度治党相得益彰

管党治党是一项系统工程，思想建党和制度治党如同鸟之两翼、车之两轮，不可或缺且不可偏废。思想建党是理想的，注重引导党员价值追求、理想信念等，以柔性的说服力、感召力弘扬自律扬善的力量；制度治党是现实的，注重规范惩戒、严明纪律底线，以刚性的行为规范彰显他律抑恶的力量。二者的紧密结合体现出思想建党和制度治党的凹凸互补性，一个侧重内省、一个侧重外约，一个标明“高线”、一个划出“底线”，以实现优势互补、相互促进，产生“1+1>2”的叠加效应。^④

（三）思想建党和制度治党相互融合、良性共生

思想建党和制度治党作为管党治党的重要手段，它们发挥作用的范围客观上具有高度的重合性，而且随着全面从严治党实践的深入，两者共同作用的范围不断扩大。然而，思想建党和制度治党作用于党的建设的方式显著不同，在实践中必然存在作用的边界问题。理论上，边界是客观存在的，但又不是固定不变的，在一定条件下思想建党和制度治党可以相互转化。因此，基于思想建

① 《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第144页。

② 《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第328页。

③ 《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第332页。

④ 陈向阳：《思想建党和制度治党必须刚柔并济同向发力》，《求实》2017年第2期。

党和制度治党相互配合、相互促进格局，两者紧密结合的第三层意涵在于促进两者之间相互转化而形成相互融合、良性共生统一体。

第一，促进思想建党向制度层面转化

从理论上而言，思想建党需要依靠具体制度展开。有西方学者认为，“对绝大多数人来说，仅靠理想主义并不足以使其恪尽职守。人的热情并非可以长期储藏的物品。那些为了某种伟大的信念而不惜牺牲生命的人或许可以坚持几分钟，甚至几个月，但要让他们为同一信念始终不渝，常常是不可能的，即便这种信念并不需要个人做出多大的奉献。”^① 思想观念本身具有变化性、反复性与不确定性，反而更容易受外界客观环境影响，一时解决不等于一劳永逸地解决，因此需要将思想建党的成果予以制度化，形成觉悟内化的保障机制。习近平总书记提出：“思想教育要结合落实制度规定来进行，抓住主要矛盾，不搞空对空。”^② 那些在思想建党过程中形成的好经验、好做法，均需要以制度形式予以固化，从而巩固思想建党的成果。例如，如何坚定党员的理想信念、如何践行党的根本宗旨、如何推进改革创新发展、如何奋发有为、如何求是求实等现实问题，都需要在思想建党进程中通过推动思想教育制度、理论学习制度、党的宣传制度、思想政治工作制度等向前发展。

第二，促进制度治党的过程形成思想认同

王岐山同志在中纪委第四次全会上指出：“法律法规再健全、体系再完备，最终还要靠人来执行。党员干部一旦在德上出问题，必然纲纪松弛、法令不行。”^③ 制度治党各项工作落实关键在人，认识提上去，制度才能落得下。试想不加强思想建设，对党的理想信念不坚定，对党的纲领、宗旨和任务不认同，就不可能深入学习与把握制度的精神内涵，甚至对制度存在偏见和不理解，那么作为处理党内关系和规范党员行为的制度就不可能立得住、管得好。因此，制度的权威不仅来自监督执纪、违纪必究的严肃性，更需要通过思想建设培育广大党员对制度的价值认同，形成制度意识、规则意识，以重视制度推进自觉了解制度、执行制度、维护制度，并在潜移默化中营造遵守制度、敬畏制度的治理文化，实现思想和制度相互融合。

① [德] 罗伯特·米歇尔斯：《寡头政治铁律——现代民主制度中的政党社会学》，任军锋等译，天津人民出版社，2003，第111页。

② 习近平：《在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总结大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14年10月9日第2版。

③ 《中国共产党第十八届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四次全体会议在京举行》，《人民日报》2014年10月26日第1版。

二 坚持思想建党和制度治党紧密结合的理论价值

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中国共产党是用马克思主义武装起来的政党，马克思主义是中国共产党人理想信念的灵魂”^①“背离或放弃马克思主义，我们党就会失去灵魂、迷失方向”^②。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对思想建党和制度治党发表了诸多重要论述，这些论述构成了坚持思想建党和制度治党紧密结合的理论渊源。而站在党的建设全局高度，系统而鲜明地将思想建党和制度治党一体提出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智慧的结晶，也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内容。这一命题的提出，是我们党进一步认识和把握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建设规律的结晶，并且在继承与发展中进一步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践的有机统一，拓宽了党的建设科学化的实现路径，开创了马克思主义党建理论的新境界，具有丰硕的理论价值。

第一，坚持思想建党和制度治党紧密结合是马克思主义党建理论新认识

党的建设是中国共产党作为马克思主义政党安身立命的“三大法宝”之一，始终被置于重要位置。特别是党的十六大以来，中国共产党基本形成了“以思想建设为先、组织建设为基、作风建设为重、制度建设为根、反腐倡廉建设为急”^③的“五位一体”党建模式。这种全面的党建模式有利于党的建设系统推进。然而，在世情、国情、党情发生深刻变化新形势下，作为执政党的中国共产党面临的挑战与肩负的使命前所未有，存在的问题亦前所未有。在全面从严治党的语境下，不仅需要面面俱到的“系统论”，更需要精准发力的“重点论”，即以坚持思想建党和制度治党紧密结合为全面从严治党寻求“治本”方略。其中，“制度治党”的提法不但体现了积极以制度为抓手管党治党的意蕴，而且首次被提升至与“思想建党”并驾齐驱的位置，昭示着“制度”将在全面从严治党的进程中扮演更加重要的角色。这一新认识，既是中国共产党在加强自身建设实践探索中总结的规律性法则，也精辟回答了新的历史条件下如何管党治党的现实问题，从根本上为纾解我们党所面临的风险与挑战提供了破题之道。

第二，坚持思想建党和制度治党紧密结合是马克思主义党建理论新思路

“法安天下，德润人心。”“法治”与“德治”均具有规范社会行为、调节

① 习近平：《在纪念马克思诞辰2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18年5月5日第2版。

②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习近平关于全面从严治党论述摘编》，中央文献出版社，2016，第69页。

③ 周鹤龄主编《六十年党的建设与党建理论》，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第5页。

社会关系、维护社会秩序的现实作用,“德法并举”已成为被历史经验证明的现代国家治理规律之一。在党的十六大上,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相结合被确立为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的方式之一,生动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对国家治理规律的认识和把握。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德法并举”,明确提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的鲜明特点是坚持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相结合,强调法治和德治两手抓、两手都要硬。”^①中国共产党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者、组织者与实践者,其党内治理体系必须与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同步推进,并在一定程度上需要引领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因此,坚持思想建党和制度治党紧密结合在某种程度上是“德法并举”的治国理政新思维在党的建设领域的延伸,既强调以思想建党培育“德治”根基,又强调以制度治党提供“法治”抓手,在两者无缝对接中实现治国理政与管党治党经验的相互促进和融合。对此,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坚持依规治党和以德治党相统一,坚持高标准和守底线相结合,把从严治党实践成果转化为道德规范和纪律要求。”^②

第三,坚持思想建党和制度治党紧密结合是马克思主义党建理论新方法

党的十八大以来,“信任不能代替监督”^③的命题在多个场合提起,对各级党组织、广大党员提出了殷切的希望。党的十八届六中全会正式提出:“各级党组织应当把信任激励同严格监督结合起来”^④,两者犹如硬币的两面形成有机统一体,构成“信任不代表不监督,监督不代表不信任”的辩证关系。坚持思想建党和制度治党紧密结合的论断内在包含了信任与监督的辩证关系,为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提供了科学辩证的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一方面,基于信任而强调思想建党,秉持传统中国“性善论”的价值理念培育广大党员闻过则喜的雅量、见贤思齐的精神、择善而从的品德,内在驱动党员领导干部向高处求善,倡导党的优良传统与作风。另一方面,监督是制度治党关键环节,即以严格的制度弥合人性的“恶”,划定党员尤其是领导干部的行为边界与行为禁区,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这一新方法,既汲取了中国传统文化基因中的有益养分,突破了西方政治文明中“人性本恶”的理论预设;又

① 《习近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三十七次集体学习时强调:坚持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相结合 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人民日报》2016年12月11日第1版。

② 习近平:《在第十八届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六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16年5月3日。

③ 《王岐山在纪检监察干部监督工作座谈会上强调 严管就是厚爱信任不能代替监督》,《人民日报》2015年9月24日。

④ 《中共十八届六中全会在京举行》,《人民日报》2016年10月28日。

以实事求是的态度对人类政治文明的有益成果予以尊重，古为今用、洋为中用，形成独具特色的党的建设理论与话语。

三 坚持思想建党和制度治党紧密结合的实现载体

基于坚持思想建党和制度治党的紧密结合的重要论断，习近平总书记提出“坚持思想建党和制度治党相统一，既要解决思想问题，也要解决制度问题，把坚定理想信念作为根本任务，把制度建设贯穿到党的各项建设之中”^①。反推之，坚持思想建党和制度治党紧密结合，既需要加强思想建设以实现反求诸己的内因驱动，也需要加强制度建设以实现监督治权的外力助推，核心是思想建党、重点是制度治党、关键是同向发力、目的是两者统一。那么，如何使两者相互协同、形成合力？如何实现知行合一？又如何实现治标与治本相结合？倘若以纯粹的形而上学的理论推演回答，无异于用抽象的话语回答抽象的问题，难以为具体的实践提供有效指引；倘若以具象的行动层面的实践方式回应，又难以有效涵盖思想建党和制度治党的方方面面。将思想建党和制度治党形成有机统一体，既不可分离、不可偏废，需要同步谋划、整体部署、一体实施，也需要找准结合点、切入点，使之同频共振、相得益彰。对此，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做出了加强党内法规制度建设的重要部署，为坚持思想建党和制度治党紧密结合提供了强有力的抓手，承载起坚持思想建党和制度治党紧密结合的时代重任。

第一，党内法规制度建设在宏观层面能够兼顾思想建党和制度治党各个方面

“小智治事，中智治人，大智立法。”作为党的制度建设的重要表现形式，党内法规制度是党的各项规定的集中体现，是中国共产党近百年革命建国、执政治国过程中积累起来的规范性资源，囊括了思想建党的制度性资源，以及中国共产党用以规范自身活动、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行为的制度性规定。它不仅将思想建党融入规范性条文之中，还是衡量我们党制度建设水平高低的重要标志，并在相当程度影响着党的生存、发展和作用的发挥。换言之，思想建党和制度治党集中体现于党内法规制度的形成与实施过程：不仅“以建促治”，“使全党各级组织和全体党员、干部都按照党内政治生活准则和党的各项规定

^① 《习近平在十九届中央纪委二次全会上发表重要讲话强调 全面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精神 以永远在路上的执着把从严治党引向深入》，《人民日报》2018年1月12日。

办事”^①；同时“以治促建”，“总结新的实践经验，建立新的制度”^②，在“建治结合”中服务于“建党”与“治党”大局。

第二，党内法规制度建设在中观层面能够理顺思想建党和制度治党之间的逻辑关系

通过党内法规制度这一媒介，一方面能够以制度的刚性巩固思想建党的成果，有效推动思想建党工作的制度化，使思想建党的成果从理论形态转化为实践形态而落地生根；另一方面能够将思想建党的优势植入制度治党的全过程，通过思想引领，旗帜鲜明地强调党内法规制度姓党、管党、为党，“避免把党的制度与党的主张割裂开来，只见制度不见党的先进性”^③。例如，《中央党内法规制定工作五年规划纲要（2013—2017年）》《中央党内法规制定工作第二个五年规划纲要（2018—2022年）》中均有较大篇幅关于党的政治建设、思想建设的阐述，不仅强调以党内法规制度夯实思想建党的成果，提升党员思想教育的针对性与有效性，而且强调党内法规制度建设始终以党的政治建设、思想建设的实质内涵为指引，在党内法规制度的字里行间传递出思想价值，使思想的“软约束”与制度的“硬规矩”一道成为广大党员的价值共识和行为引领。

第三，党内法规制度建设在微观层面能够精准呈现思想建党和制度治党成果

其不但通过规范性表达将思想建党和制度治党的具体实现过程予以全景式展现，而且能够针对思想建党和制度治党过程中的问题做出回应性调整。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管党治党，坚持依法治国和依规治党有机统一，以党章为根本遵循，不断加强党内法规制度建设。我们党在长期实践中形成的优良传统、党的组织长期坚持的优良做法、党员干部长期秉持的优良作风，均被提炼成为党内法规制度重要内容。从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把中央八项规定作为加强作风建设的突破口，直指群众反映强烈的“四风问题”，到“坚持理想信念”“四个意识”“严明党的政治纪律”等措辞载入《关于新形势下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从《中国共产党廉洁自律准则》字字珠玑，标注党员及领导干部立德向善的高线，到《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突出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增加落实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和反对“四风”等实践成果，划定党员及领导干部不可触碰的底线；从“两学一做”学习教育常态化制度化写入党的章程，到《中国

① 习近平：《在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总结大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14年10月9日。

② 中共中央办公厅编《习近平关于制度治党、依规治党论述摘编》内部本，2017，第68页。

③ 韩强：《把思想建党和制度治党高度结合的几点思考》，《理论探索》2016年第6期。

共产党思想道德准则》《中国共产党密切联系群众准则》等形塑共产党人精神支柱和政治灵魂的党内法规酝酿筹划，思想建设的“软倡议”逐步向刚性制度的“硬要求”转变。一系列兼具思想教育与制度规范的组合拳，已经超越了和风细雨的道德教化与润物无声的理论说教，而是以雷霆万钧之势打造制度的笼子，为我们党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汇聚起强大势能。